

A large, expressiv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bird in flight, possibly a crane or heron,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title. The bird is depicted with broad, sweeping strokes for the wings and tail, and more detailed, vertical strokes for the feathers. The ink varies in concentration,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王明问题研究

续集

施巨流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王明问题研究

文集

施巨流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ISBN 978—962—450—251—0/E · 00251



王明问题研究 续集

著者 施巨流
编审 贾子轩

出版发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3 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印刷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印数：1—400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6 印张

字数：110 千字

定价：港币 43.50 元 人民币 36 元

2012 年 9 月 28 日

王明问题研究

续 集

著者 施巨流

编审 贾子轩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前 言

施老巨流同志所著的《王明问题研究》，2006年6月出版之后，深为学者和读者关注与正视。尽管反响不一，可是毕竟引起更多的人对党史重要争议人物王明的深度思考。

近几年来，施老未因寿高、体弱、多病而停止对王明问题的研究，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又有新的成果。再之，一些获悉此事的学者和读者，不断致信作者索要《王明问题研究》。施老手中已无书可赠，他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将王明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对瞿秋白有关问题的研究）集中起来，加上过去对王明问题研究的提出与研究过程中的艰辛经历，和盘托出，综合性地编一本续集，以满足诸方愿望。

施老在建国前从事新四军武工队和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又一直从事共青团团干、团校教育和马列主义、党校教学科研工作，因此，续集的后一部分是对革命历程的回忆。对个人在革命队伍、在党组织中从成长、成熟到成业、成家的坎坷历练的回顾，又从另一个微观的局部、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党内外斗争、革命营垒内

外斗争、革命胜利后建设事业发展道路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艰巨性和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同时也使我们管窥到对谬误的抵制、纠正与排除，对真理的坚持、维护与捍卫，对各种矛盾斗争真实历史的客观认识是多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是多么惊世骇俗！

王明有不少错误是无疑的，包括他在莫斯科写的《中共50年》一书，至于是多大程度的错误，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则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客观分析。对党的历史人物，当他们在为党、为革命事业做工作时，都有大小不等的功绩和奉献；当他们在工作和奋斗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时，都不能搞“一错百错，对也是错，一棍子打死”。投敌叛变，那就不是犯错误的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部，以“左”反“左”反右，以“左”批“左”批右，以“左”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都不是共产党人的做法，都不能正确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前人制造冤假错案，后人起来翻案。这样的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历史是检验真理的长河。

施老潜心研究王明问题已有20多年了，成就丰硕，功苦同在。对王明这样一个被党史决议、伟人定论了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在政治民主空气较为宽松的现实环境下，也不无风雨莫测之忧。然而施老却铆足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运用已有的文献、档案、传记、遗作等各种史料，对存在的诸多疑点、焦点，展开有根有据的

剖析，公开、坦率、直接地论事、论人、论理，尽可能还历史本来面目。这种敢于碰硬、勇于较真、勤于探索、无私无畏的精神，这种事中求实、去粗取精、事实确当；非中求是、去伪存真、是非分明的精神，这种对党、对历史人物、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不仅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党性所在，同时是党校教学科研工作者的天职所使然，非常值得敬佩和肯定。

王明问题研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继续研究，透彻研究。完全有理由相信，党心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王明的功过是非也会有公正的评论。

贾子轩

2012年5月18日

写于贵阳南明堂十本斋

目 录

前言	贾子轩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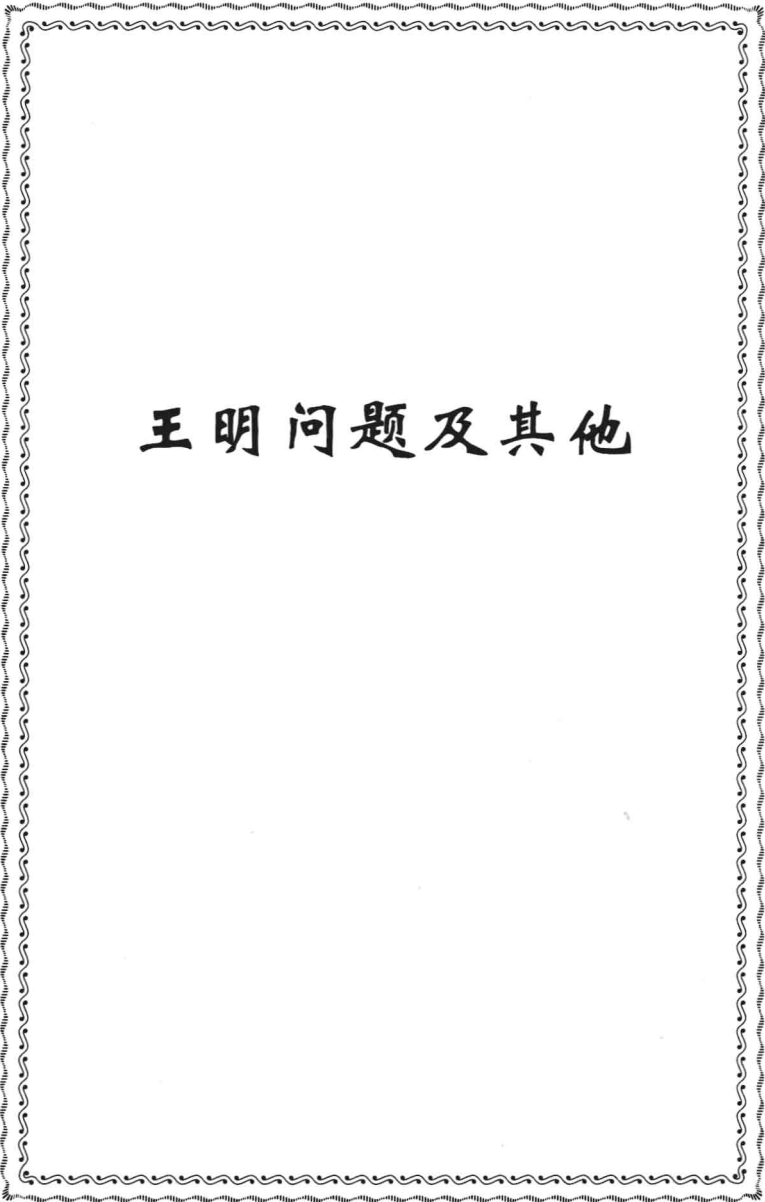
王明问题及其他

《王明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	(3)
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以王明为首	(3)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的政治纲领	(5)
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由来	(6)
苏区“肃反”与王明	(8)
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究竟是谁	(10)
毛泽东思想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是以王明 为代表	(11)
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问题	(15)
“两个一切”是正确的	(19)
王明没有反对毛泽东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	(21)
华中游击战争的开展与“丧失良机论”	(22)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不知从何而来	(25)
毛泽东“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27)
编写党史的指导思想问题	(2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王明	(30)

季米特洛夫指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是违反历史逻辑的	(52)
重读王明《中共50年》之后	(61)
瞿秋白对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	
.....	(92)
《王明问题研究》一书产生的经过	(103)
老当益壮 笔耕不辍	
——记我校离休干部施巨流同志	(113)
贾子轩同志的来信	(115)

革命历程回忆

我的回顾	
——抚今追昔六十八年	(119)
共产主义理想鼓舞我奋进	(159)
淮北中学“反特”亲历记	(162)
中央大学丁家桥分校地下斗争回忆	(166)
永久的怀念	
——忆姚克同志	(176)



王明问题及其他

《王明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

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不是以王明为首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简称《决议》）中说，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以王明为首，这个说法不符合实际。王明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一个学生，回国后到六届四中全会前夕是一个一般干部，六届四中全会选入中央政治局，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上面还有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三个常委，向忠发是常委会主席。大家都晓得，党内的常识是常委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他领导着全党，党内的日常工作和重大问题，以及非常时期出现的问题由常委会决定，常委会的主席又有他的特殊作用，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开会时他只是参加会议讨论，投票时他只是一票，并且开会时很少采用投票的方式，大都是主席最后归纳一下会议就结束了，他根本不可能操纵政治局和全党，并且六届四中全会以前及其以后的半年时间内是米夫操纵的，政治局和常委都得听命于米夫，王明也是如此，他

不可能操纵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加在王明头上的这顶帽子应当去掉。

193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是中共中央的下属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之间的联络机构，他不是中共中央上面的领导中共中央的权力机构。他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听命于中共中央的组织，是中共中央下面的一个部门。“十二月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说得很明白，决议中说“在王明领导之下的代表团，是满意的完成了中央与共产国际给予他们的任务”，这个时间包括了从1931年下半年到1937年“12月会议”以前的六年多时间。

代表团既然是中共中央领导的下属组织，他无权领导指挥中共中央。因之，不能把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和临时中共中央的错误和责任强加在王明的头上，如果在这一段时间，王明提出了什么错误意见，临时中央接受了，那主要责任在临时中央而不在王明。正如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一样，下面组织提出了什么错误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并且造成了恶果，那主要责任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身上，而不是由下属组织来承担。

从以上情况说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王明为首的说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领导的，在《决议》上只歌颂他们的英明和正确部

份，对他们的错误和所造成的损失避而不谈，对他们的错误和造成的恶果找到了一个替死鬼，把责任推到王明身上，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实际，道理上当然也说不通。

《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长期以来，一直把王明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当成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这并不符合实际。《两条路线》小册子的内容主要错误是：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上，他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全国范围内要实行进攻的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很快的就可以到来，他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几个主要省份，他特别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王明在小册子中所阐述的错误是从何而来的呢？王明还是很坦白，王明在这个小册子开头《几点必要的声明》中就坦白的说，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当时国际发表的几种决议材料写成的”。所以说《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而是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并且我党中央的文件决议以及党中央很多领导人都照抄照转过这些内容，王明对这些问题也不过是老调重弹，这些东西都

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不能把这顶帽子戴在王明的头上。

还有，王明在这个小册子中对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一些正确的论述也有反映，如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蒋的革命，要大力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农民的政权和苏维埃政权，要建立农民武装，并且一再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些理论推动了根据地的出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并且，后来又一再的强调要建立扩大红军和根据地。不能否定小册子内容的正确部份，就是说，《两条路线》小册子既有“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又有正确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不管错误的一面或正确的一面，根子都在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那里，而不是在王明那里。错误的王明不负主要责任，正确的功绩和荣誉也不属于他的。

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由来

《决议》中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阶级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派别积极的起来反对日寇的侵略。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宰者们，仍然断定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由来。

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国际宣布蒋介石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成为人民的敌人。四月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宣

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敌人。“四·一二”后半个月，我党召开了“五大”，在“五大”的会上我党也宣布了蒋介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他们把蒋介石与民族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蒋介石成为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变成了人民革命的敌人。1927年5月18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八次全会，对中国问题作出了决议，决议说，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成为反革命的力量，今后不能对他们进行联合和妥协。1927年“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说，一切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些反革命势力包括军阀、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1927年12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的决议中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就是说变成了敌人。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中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成为人民的敌人，并且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中共六大尚未结束，国际六大就召开了，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支持共产国际这种看法，纷纷发表声明进行了谴责，并把中间势力变成为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成为各国共产党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共产国际的这种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接受了的，瞿秋白等历届中央领导人都是拥护这种理论并加以贯彻了的。毛泽东亦不例外，他在《反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中还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的可能。就是说他现在仍是人民的敌人，但有转变的可能。在解放后修改后出版的《毛选》中，仍一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过革命反对过革命。所以，对待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错误，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各国共产党的共同错误，不能把这个错误放在博古尤其王明的身上，因为王明不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同的经验教训来吸取。不应当放在那个个人的身上。

苏区“肃反”与王明

一些书籍和文章中说，各个苏区“肃反”扩大化主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并且王明又派去了亲信贯彻执行“左”倾路线，大搞“肃反”。因而，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0年12月25日，王明任江南省委书记前，他还是一个学生和一般干部，不可能参与此事。并且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一些地方就在大搞“肃反”抓AB团了。毛泽东领导主持下出现的“富田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入了政治局，但他只是政治局的一般成员，上面还有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后，米夫仍留在中国半年时间，监督四中全会决议的执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可能操纵派人去搞“肃反”。会后，2月派中央代表团（又称“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中央苏区，3月派夏曦去湘鄂西，4月派张国焘去鄂豫皖，这时米夫和政治局常委三人都在，张国焘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政